

回忆录

张林



我是怎样走过自己人生之路的

一、儿童、少年时期

我是山西闻喜县堰掌镇人（现属夏县）。1929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小名张怀洛，大名张林，现年80岁。听母亲说爷爷是个大善人，把自己家的房地产卖了，替朋友还债，家里只留二亩地，住别人的房子。后来靠父亲教书收入，母亲料理家务，慢慢买了房子置了地，逐渐发展为中等家庭，这些全靠母亲勤劳吃苦，节俭治家。因母亲是农家出身，善长治理家境。父亲在外工作。光景过的总算象个样子了，我七岁入本村小学读书，过着童年的幸福生活。好景不长，一九三八年日寇侵占闻喜，进驻我村我家，全家人逃难在外，老百姓前面跑，敌人后面追。记得我们一直逃到中条山，躲在一个山沟里，下边是河槽，河边是大石块，人住在石板上，用干馍片沾水吃，喝的河水。东逃西跑，最后全家下山落脚仁义庄村，住在大舅家牛院里的两间房子里，一住就是四、五年。不久日军松本派人到仁义庄劝父亲给他们做事，父亲借口有病拒绝。当天来人走后，父亲觉得事情不妙，立即上山躲避，第二天，日军派兵前来逮捕使鬼子扑了个空，后来父亲受抗日政府王宿仁县长委托，在中条

山办抗日民主学校，校名定为大峪民革两级学校。他聘请了剡希何（共产党员）、刘光华二位老师，校址在大峪村一家群众的四合院内。这样以后就把我也接去上学，还不断为学校跑小腿送书信。记得一次下着毛毛雨，我还和婶母去五里外的县政府送信，县长妻子经常到学校教学生们唱歌，唱的是：“打杀汉奸，打杀汉奸，汉奸是心腹的大患……。”学校由开始30余人，发展到150多人，那年冬天日军封了山，学校迁移到富峪，从此敌人经常在附近骚扰，学生便减少了，我也停学回仁义庄。

二、困苦的难民生活

自从日寇侵占我家，全家人逃荒在外，一无所有，开始向别人借粮吃，后来想法每天挖野菜补充，如地菜、小蒜、油勺、白蒿、榆钱、椿叶等；拾柴，挖药材；麦收时拾麦。从搭镰到犁完麦茬地，一料就拾一担多麦子，母亲有病我还要她陪我去拾，一天都不愿耽误，回想我太不懂事了。除此之外，我们纺线织布，做鞋去卖，我虽只十二、三岁，从小个性要强，样样活儿不落后，一晚上纳一只鞋底，一天能纺四两棉花，就这样赶集卖布卖鞋和给别人纺线挣来钱买粮油等维持生活。居人檐下看人脸色，吃不尽的苦，受不完的气，母亲的眼泪哭干了，眼睛哭坏了，真是度日如年。因世道混乱和生活困难姐姐十六岁就

出嫁了……。

经过这段艰苦日子的磨练使我渐渐地成熟，增长了见识，因我们和长工同住牛院，亲眼看到穷人的磨难与痛苦，使我加深了和劳苦大众的感情，懂得了不少人情世故，加之复杂家庭环境的磨练，造就了本身能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我参加革命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培养出坚强毅力，勇敢朴素的精神，和穷苦大众站在一起。

三、随父亲进运城

1943年父亲患重病，朋友王道勋将他叫到运城治病，并介绍他到运城师范学校任教，边工作边就医，母亲跟随护理，不久把我也接到运城，送入运师附小三年级上学，后转新民小学上四年级，停半年又跳入五年级，真是跳跃式的学生，回到家后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把功课要赶上去。

由于父亲还得治病，高昂的医药费用，使家庭的经济更较紧张，生活甚是艰苦，常常吃的是玉谷面糊糊，煮菜叶煮红薯等充饥，一斤食油吃几个月，基本是水煮萝卜白菜，加点盐和辣椒面，此时好心的学生也常给父亲送来些钱粮，在八口之家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由他的学生张德轩介绍，父母之命，于1944年冬天与上郭村郭可学在夏县城结婚，只有十六岁的我，根本不懂什么爱情，只能服从大人的意见，

男方家系继母，自己家也很困难，所以我们结婚什么都没有，父亲就这样把我发落嫁了，成立了二人小家庭，靠他小职员的工资生活，他在夏县工作，我在夏县高校上六年级，45年夏季又投奔老人回到运城安居，父亲给他找了工作，我到一中心小学上六年级，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告日本投降全国胜利，1945年10月我考入运城明德中学，后与补习中学、二联中合并为运城中学。校址是现在的运城棉科所。每天早出带干粮，晚上回家再吃饭，46年暑假后因怀孕停学，处于兵荒马乱，国难当头的年代，上学是何等的艰难，除父亲在家给补课外，主要是自己刻苦学习。

十六岁前我患过两次大病，一次是在仁义庄难民生活中得了疟疾病，三天犯一次，犯病时就是盖上几床被子身上还发冷不止。缺医少药，只能用民间偏方来治，延续三个多月才慢慢好转，一次是在运城一年的暑假中得了伤寒，母亲回老家去了，只有我独自在家里住，父亲在学校住，因伤寒传染，必须隔离，父亲每天请医生给我打针，服药灌肠等积极治疗，还得给我送水送饭，我整整昏睡十余天才好转，这么严重的病，阎王爷都没把我叫走，说明我命不该绝。

四、参加工作实现梦想

运城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宣传，许多学生教员等人都逃往西安。因父亲对局势有认识，主张全家都不

走。运城于47年底解放了，真是拨开乌云见晴天，人人欢天喜地搞庆祝。

一九四八年七月我参加了革命工作，到晋南中学（康杰中学前身）附小任教。四九年冬季参加解州文教班学习，加入了共青团组织。但深感文化水平太低，力不胜任，五零年春结业回校后，由本人申请，领导批准到晋南中学进修学习，学习一个学期，暑假去太原报考卫校未能录取，由父亲托人介绍到省木材公司工作。后来可学不同意我工作，动员要我继续上学，因而又申请经领导吴采卿经理批准返校学习。在初中十五班学习期间享受二等助学金，每月五元，五二年六月将要毕业，运城地委指令从各中学选调一批青年团的干部。我年龄大些，又在学校团总支担任组织委员和学生会的干部，是入党培养对象，所以又被抽出来参加工作，共选抽五人，都是学生中的骨干，经团地委培训后，于1952年5月分配猗氏团县委工作。53年九月调回运城团地委组织部。五四年九月运城临汾合并地区，我留运城镇团委，后改名安邑团县委，运城团县委，历任组织部干事，副部长，部长职务，五八年大跃进合并大县试点供给制，11月份调任红色保育院任院长，筹建成立保育院，计划总院下设两个分院，规模较大，后停止试行供给制，就只办一个保育院，收幼托儿300余人，一千就是十三年。1971年

10月调饮食服务公司任副主任，77年三月调糖业烟酒公司任副支书副经理，主管政工人事，1989年11月28日离休。

前后在各处任职40多年，无论在哪里都是埋头苦干，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服务，在团委工作主要是下乡做群众工作，所以我的孩子大都送给人奶，把婉兰，素兰送到百里之外的夏县堰掌和西下庄，阿丽送到永济，一周后领导通知不去临汾让我留运城，这样又把阿丽接回来自己奶，也没有奶成样子，不断外出开会，孩子一丢就是七、八天，自己的奶水吸着往外倒，慢慢奶水自然减少就没有了。下边的两个小孩只好吃别人的顿奶和牛奶。每当孩子往奶妈家送时，我这做母亲的实在难分难舍，心疼的很。为工作只好如此，在工作中不管有多大困难曲折与艰险，我都能克服，忍耐，自强不息，在保育院时，儿子正出麻疹，病得很严重，因误诊麻疹出不来，皮肤发青，孩子难受的头在床上碰，此时上级通知我去河南参观，我到教育局幼教室请假说明儿子病重不能去，让别的同志去吧，曲兰峰不同意，非让我去不行，当时处于大跃进的形势，二话没说把孩子丢给母亲就走了，但心里一路惦记着孩子，不知是死是活，回去看到的是什么状态……。

从没因孩子多，家务重请过假，孩子们都由母亲

照看，我全部精力投入工作。我的理想就是不求名利，踏实苦干，任劳任怨多做奉献，对党忠心耿耿，在岗位工作与搞运动中对事和人的问题处理时都能掌握原则，凡能宽的决不严，能缩小的不扩大，实事求是按政策办理。关心职工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平易近人，团结同志，对人宽容，对工作都能出色地去完成，获得领导与群众的好评，多次被评为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奖状拿到很多张，物资奖也得的不少。

在康中上学时出席过省学代会，运城团县委工作出席过省团代会。53年元月在猗氏团县委加入中国共产党将近50年的党龄。属于副县团级（行政18级）。其中56年在省团校学习过半年，曾在县委举办的贫协讲习所担任辅导员数月和贫下中农学员同吃同住，睡在大宿舍的通铺上，三九寒天连火炉也没有，当时虽任保育院院长，进入中年期和青年人一起经受锻炼，根本不觉得受罪心里像装着一盆火，精神上吸收了政治营养。七零年在龙居公社袁家庄，南花村搞过两期三大运动，在运城市饮食服务公司搞过一期，都担任队长，每期半年，验收后领导和群众都很满意。

1956年六月我和县委宣传部姚宗正二人代表运城县赴临汾地委报到，参加山西代表团去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一天正在聚精会神参观时，忽听喇叭通知各代表团速到门口集合，不知何事，走到外面负责人

组织各代表团分头上车，车就开。进了国务院怀仁堂，刚宣布毛主席要接见，并念几条纪律，代表们走到草坪地站成半圆圈，毛主席、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来挥手绕过，然后坐在中间椅子上，就开始照相，领导走后，才让代表退场。那时刻激动的热泪盈眶整夜难眠，我想一个小小的青年团干部，普通的女干部，受到毛主席接见，真是天大的幸福，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这是首次去北京，把名胜古迹都游览了个遍，所看到的景点与北京城的风光，都觉得非常新鲜，实在令人兴奋，回县后将参观和毛主席接见的盛况向团代会作了传达汇报，大家异口同声称赞我有这么好的机会，太幸福了。全国代表几千人哩，用转机照的相，我只洗到照上我的地方，约有二尺多长。这张照片便当作珍贵的财富来保存。文革开始要打倒刘、邓，接见时刘少奇和周总理出国不在，照片上有邓小平，若被红卫兵抄家发现，这是何等大的罪过，至少要把照片拿走。因此我在房内的暗角里挖了个洞，用纸卷好埋在内边，这样还是放心不下，转藏了好几处，总算安全的保留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性的照片。

五、命运注定了我吗

我有六个孩子，五女一男和母亲共九口人，主靠两个人的工资和勤俭节约维持生活。好的一面在猗氏工作阶段国家对女干部孩子实行保健补贴，第一个孩

子每月22元，第二个每月16元，第三个每月12元，我的工资每月40余元，后加到60多元，可学工资60多元，相当中等水平。二人正处于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积极向上往前奔的时候，57年可学他被错划为右派，受降一级处分，月工资降为57元，延续20多年。这对我在政治方面是沉重的打击，一落千丈，人前抬不起头，风言冷语随之而来。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又任领导职务，工作真难为情，对人无法张口，压力太大，这滋味难受极了，内心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下步路该如何走呢，从客观上说应与他分手，否则不会有什么家庭幸福，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思前顾后，暗自痛哭，常常以泪洗脸，孩子们怎么办，怎能忍心丢下她们不管，形成家破人散，必须要考虑到孩子们的前途，要保护好我们的孩子。只有选择牺牲自己，维持一个完整的家庭，同时，又和父母交换意见，父亲开导说全国几百万右派，难道都离婚吗！母亲哭着对我说，不能使孩子没有亲爸，就这样个人承受着压力和痛苦。为了孩子同情丈夫身世和处境，还得安慰和鼓励他好好改造，自己便挺身站起来，硬着头皮干工作，鼓起勇气去做人，好在党组织还能正确对待我，信任我，有啥不敢大胆的去干呢？什么风言冷语酸甜苦辣通通都能忍受着，关心我的老领导说：张林怎么能和这样一个人一起生活，他们确实是在同情我，形

势逼着我挑起家庭的千斤重担，子女的求学，就业等内外事情全落我的肩上，因为他没有了人身自由和发言权。

63年县委决定提我任县妇联副主任，有人给我通风后，自觉个人的政治背景不宜去，所以及时找领导，借口母亲有病不能离开，请求不要调我，领导同意不调了，若是那次去了，文革中还不知把我整成啥样子，谁料到他的问题还未了结，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又来临了，先给贴大字报的就是他，说什么反动学术权威、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帽子全戴上了，新旧帐一起算，不断批斗戴高帽挂牌游街、抄家，将他打入劳改队，彻底没了人格和自由。家人受到严重影响，子女在中学成了黑五类，串联上学没资格，当时我也算是当权派，是挨整对象。受极左路线的株连，把人害苦了。尽管路途坎坷，但我仍继续前走不回头，相信总有一天党的政策会落实，是非要分清。人生就是这样，没有绝对的一帆风顺，也没有永远的坎坷，要学会辩证的看事情，辩证地看待自身拥有的优势和弱势。要珍惜生命，和命运作拼搏的斗争，改变自己的命运。

大女系康中教工子女，高中录取完全应分到康中，就因她父亲的影响，分配到解州中学，一年后，才想法转到康中。高中毕业高考，因政审不过关而未

被录取。当时省劳动厅，教育厅联合通知要在未被录学生中安排一些人到厂矿去工作，县知青办组织集体插队，我要求等上边通知下来，如不安排再下去插队。但他们不执行政策，强制先下乡插队，通知来了再回。结果插北相任留村不几天，省里通知如兰到大同齿轮厂工作，知青办死活不让走，不放人，好在户口还在如兰口袋未交，知青办人每天像特务似的跟踪我，这样捉迷藏式的乘机将如兰送走，那时我主意很坚决，实在接受不了他们的霸道作风，真是欺人太甚，他们又给我写大字报贴在保育院，我全不在乎……。以后又组织插队，再不愿参加集体去插，便把二女、三女送回老家返乡插队，直接接受本地贫下中农教育，看能影响到哪儿去。但是我们大人不在身边，她们单独生活，也吃尽了苦，每次回去看见素兰的生活状况，走时总是不由含泪而走，有什么法子呢！天无绝人之路，党中央终于关于落实知青政策下达了，按照政策婉兰安排闻喜钾肥厂工作，素兰安排裴社供销社当营业员，后托人帮助把素兰调回运城地区五交化公司工作。阿丽和红歌报名永济电机厂和油泵厂，政审一次次在康中写的证明是她父亲出身不好，历史加现行等，两厂都不招收。此时镇委安置办郭顺当同志说：不要康中证明，到你饮食服务公司打个证明得了，这才把阿丽安排洗衣粉厂，红歌安到盐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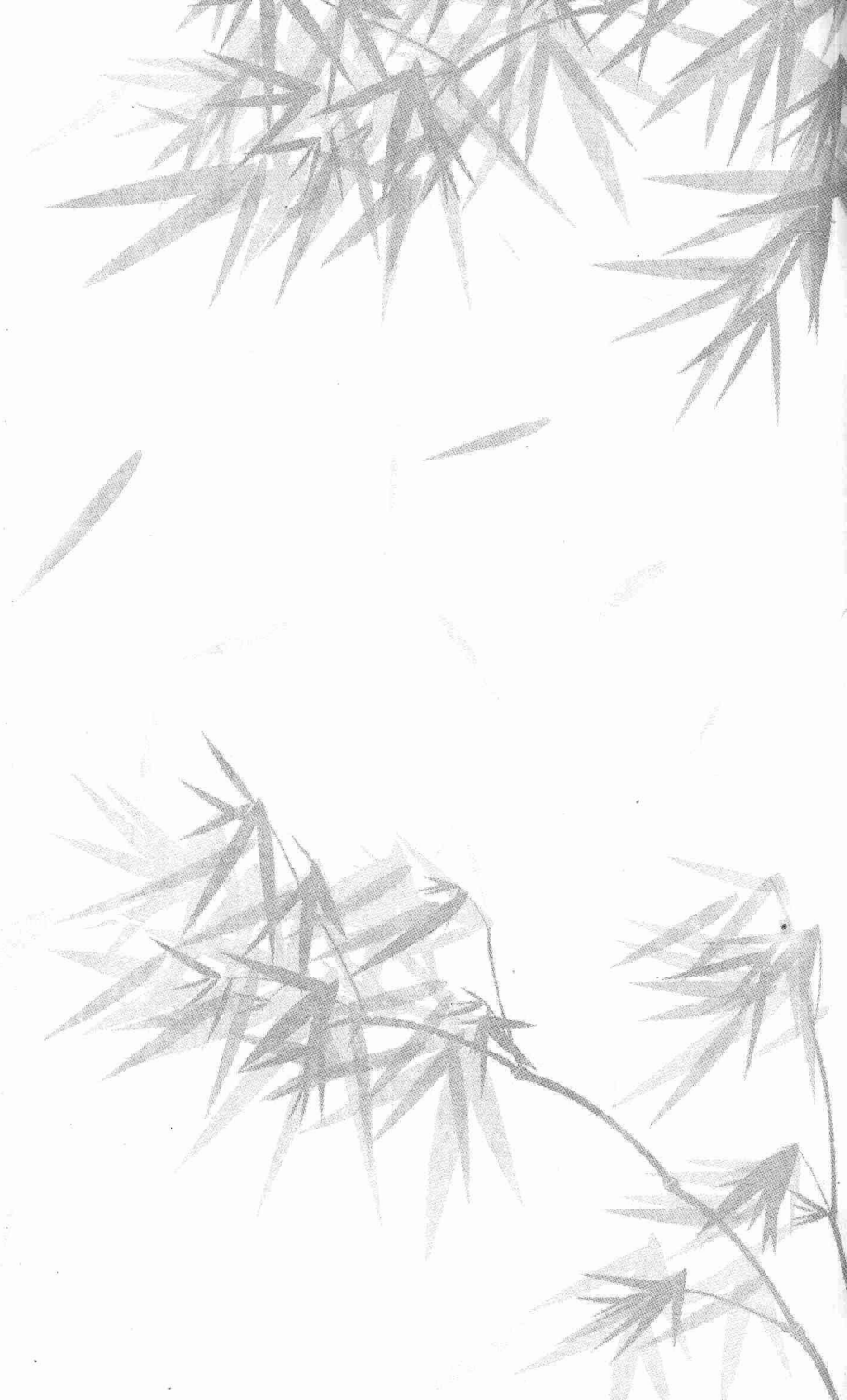
厂，后红歌又调局里当电话员，又调医院学护士。郭力艺校毕业工作一段后，我把他调到糖业烟酒公司，又分到烟草公司，媳妇海燕进康中也是我协助可学办的，为孩子们的工作，我没有少跑腿，给人说好话，上门去求情，是我作母亲的义务。

二十年来他没资格再提级增资，我虽有时增加工资，但人口多孩子都正在上学，生活也比较困难，再紧张我从不向单位申请救济，不向亲朋开口，我认为人总要有骨气，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有时领导与同志看到我的实情，给送一份救济款。孩子们写作业大都用旧废纸翻过来钉成本再用。衣服是大的穿了小的穿，破了缝缝补补还得穿。同时让她们礼拜天和假期拾炭核做饭取暖，家里没有买过煤。另外孩子们放了假割草卖草，去棉科所、木业社当小工等收入来补贴经济的困难。我坐月子只休息一礼拜就为孩子们做衣服，准备来年穿。五十六天产假满就上班，风雨无阻。不仅自己能吃苦耐劳，同时也培养锻炼了孩子们的吃苦节俭精神，她们没有娇气，不讲穿戴，能刻苦学习。

几个女儿在特殊环境中结的婚，婚事办的非常简单，我主张提高女性的政治地位，家里再困难也不会把姑娘当商品出卖，所以不向对方要一分钱财礼和东西，基本上也不陪嫁妆，在这点上我认为带了好

头，跟随时代的。大女对象当时在北京上学，因年龄关系，学校工宣队批准他们结婚，在北京地质学院同学们开个茶话会就把婚结了，双方家里什么都没准备也没去人。二女在农村插队，形势所迫与县城农民结婚，由于在农村也得随风就俗，准备些简单嫁妆。三、四、五三个女儿同样什么也没有，我只给她们每人做两床被子，（素兰是床被子和胖褥，实际也顶两个被子，我喜欢胖褥）。记得二女婆家拿过100元，全用于她。四女家拿过300元，我让交给四女本人由她使用，总之我没有花过对方家一分钱，对象都是她们自由的，我们做父母的决不把自己意见强加给她们。就这样各自建立了小家庭……。自己就是在那种坎坎坷坷路程中走过来的，别人没有承受过的我都承受了。





瞬间永存



2000.4.28.-70周岁



学习中



学生时期



青年时期



中年时期



运城贫协讲习所任辅导员